研究筆記

文化大革命始於何時？
——「起點」問題再探

● 吳一慶

一　對一個「歷史常識」的追問

文化大革命究竟是甚麼時候開始的？這似乎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。1966年5月16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央委員會〈通知〉（通稱〈五一六通知〉，以下亦簡稱〈通知〉），此為文革發動的正式標誌①。這在官方記載與學術論述中久已成為定論。然而，歷史果真如此確定嗎？胡適提出過一句廣為流傳的學術箴言：「做學問要於不疑處有疑」②。正是在那些看似毋庸置疑的地方，學術探究尤應保持開放與追問的態度。

事實上，關於文革的起始，長期以來存在多種界定，與今日被普遍接受的歷史常識並不一致。一個典型例證可見於1966年6月1日《人民日報》頭版社論〈橫掃一切牛鬼蛇神〉。這篇由新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主持撰寫的重要社論指出，「在短短的幾個月內」，「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」，已在全國興起③。這一措辭引出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：若文革確始於〈通知〉，那為何僅兩周後，運動的「高潮」就已經持續了「幾個月」？顯然，在社論作者的理解中，文革早在〈通知〉發布前便已發生。更重要的是，這篇社論的這種說法可以和〈通知〉中的內容互相印證。例如，〈通知〉指責彭真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制定的〈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〉（又稱〈二月提綱〉）對「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……陽奉陰違，竭力抗拒」。〈通知〉文中亦在多處以「進行時」語氣描述文革，通篇聚焦於運動前期出現的諸多錯誤④。這表明，在包括毛澤東在內的〈通知〉的作者看來，文革已在進行中，〈通知〉號召矯正錯誤與克服障礙，而並非宣告一場新的運動的開始。

關於文革運動在1966年5月前已然啟動的觀點，有多種說法，其中有些在文革期間就頗為流行。

第一種說法是，1965年11月姚文元發文批判京劇《海瑞罷官》，這是文革發動的「序幕」或「第一炮」。有美國現代中國研究「奠基人」之譽的已故哈

佛大學教授費正清(John K. Fairbank)在其《偉大的中國革命：1800-1985》(*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: 1800-1985*)一書中，明確提出文革始於批判《海瑞罷官》，這一判斷在海外學界頗具代表性⑤。

文革期間的諸多材料都作出了類似的界定。例如，1966年6月《紅旗》雜誌社論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〉明確提出，姚文元發文批判《海瑞罷官》「吹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號角」⑥。同年8月6日，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在接見學生時表示，文化大革命從1965年11月姚文元發文開始，到1966年6月1日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為止，「這期間，經過了二百天」⑦。10月，《紅旗》雜誌另一篇社論稱，「1965年下半年，毛澤東同志親自發動和領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」⑧；10月29日，張春橋講話中又稱，文革從批判《海瑞罷官》算起「剛一年」⑨。

第二種說法是，1960年代中期以江青為主導、毛澤東大力支持的「文藝革命」和「戲劇革命」，才是文革的「真正開端」。這一看法今日已不多見，但當年曾廣泛流行於官方文件、領導人講話和官方媒體言論中。文革期間的紅衛兵材料甚至稱，劉少奇、鄧小平早在1964年初就「抵制、反對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」⑩。

例如，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發的〈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〉(以下簡稱〈紀要〉)就明確指出：「全國解放以後，文藝戰線上的多次重大鬥爭，和近三年來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，都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。」〈紀要〉特別強調：「近三年來，社會主義的文化大革命已經出現了新的形勢，革命現代京劇的興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。」⑪18日，《解放軍報》發表社論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，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〉稱：「一個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經出現」，「這個偉大的革命潮流，必將蕩滌一切舊時代資產階級文藝思潮的污濁，開創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文藝的新紀元」⑫。類似表述在文革期間亦屢見不鮮。7月24日，陳伯達在講話中指出：「京劇改革，是文化革命很重要的開端。」⑬11月28日，陳伯達在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講話時進一步強調：「八屆十中全會以來的文藝革命，成為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的開端。」⑭經毛澤東審定的《人民日報》、《紅旗》雜誌1967年元旦社論更直接確認了上述說法：「一九六三年，在毛主席親自指導下，我國進行的以戲劇改革為主要標誌的文藝革命，實際上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開端。」⑮5月6日，《紅旗》雜誌社論〈歡呼京劇革命的偉大勝利〉再次重申：「京劇革命，吹響了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進軍號，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開端。」⑯

文革時期還流傳過一種相對少見的觀點，即將1966年6月初北大「第一張大字報」的公開傳播視為文革的起點。10月底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在一次講話中說，文革運動的時間還不長，「從六月份算起的話，還不到五個月」⑰。12月，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陶鑄在一次報告中稱，「六月一號聶元梓的大字報出來以後，全國掀起了一個蓬蓬勃勃的文化大革命運動」⑱。政治學者王紹光在其研究武漢文革的專著中亦持此說，認為6月1日北大